

# 宋室南渡与文化版图的重组

## ——以宋代文人及其文学活动为切入点

钱建状 李本红

(厦门大学文学院, 福建厦门 361005; 学术界杂志社, 安徽合肥 230051)

摘要:前贤关于宋室文化重心南移时间的争论,表面上是因衡量标准的不同而引起的,但他们的共同缺失在于:对历史现象的复杂性估计不够,尤其是忽略了各种文化因子的动态发展。因而,乐观地认为在北宋之际文化重心已经南移,是不科学的,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。只有在宋室南渡以后,因着空前的革命性变化,大规模的人才流动最终得以完成,南北方文人数量极其悬殊,北宋的以开封、洛阳为文化重镇的“点”状分布格局被打破,并且从精英荟萃的江浙一带到化外之境的岭南,北宋时南方尚存的一些文化空白进一步被填补,至此,南方的文化优势全方位地凸现出来,一场争论才真正划上了句号。

关键词:宋室南渡;文化版图;文人;文学活动

中图分类号:G07

文献标识码:A

宋室南渡以后所谓文化版图的重组,包含两层意思:一是指文化重心的南移,这是就南宋统治下的南方与金人统治下的北方相比而言的;一是指原有的南方的文化格局发生了变化,这是就相对于北宋的文化分布状态而言的。

### 一 研究的前提:充分注意历史现象的复杂性及各种文化因子的动态发展

唐宋以来,中国的文化重心一直保持着南移的态势,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。但是文化重心的南移究竟完成于何时,学术界存在着争论。多数学者认为宋室南渡以后,中国的文化重心完全移到了南方,也有一些学者认为,文化重心至迟于北宋末已经南移。造成这种分歧的原因,首先是文化本身是一个包涵了制度、器物、精神等多层面的复杂系统,如果以其中的一种作为衡量的标准,得出的结论必然有所不同。如以组成文化的一个重要环节——书业贸易来看,北宋之时,宋代的售书地区,南方有100多处,而北方不足10处<sup>①</sup>。比较起来看,北方的书业贸易远不及南方,因此文化重心似乎当然地居于南方。但如以政治人才来看,据《宋史·宰辅表》,北宋实任宰相71人,其中北方42人,南方29人。这又似乎是文化重心居于北方。衡量标准的不统一,实际上说明了研究者的研究逻辑起点不统一,不在同一层面上讨论问题,分歧难免要产生。其次,对历史现象的复杂性估计不够,是产生分歧的本质原因,也是前此研究者的共同缺失。具体表现为:1.就研究心态来说,研究者多在“是”与“否”中强加选择,要么认为文化重心已经南移,要么不是。这就使研究者在归纳材料时会有意地忽视一些“无关紧要”的历史现象,从而不能有所发现。如从经济与文化的互动关系来看,则在北宋,南方的经济实力已明显高于北方,因此文化重心当然地被视为在南方。但如果考虑到实际的消费状况,则情况又复杂得多。由于政治中心在北方,南方的各种产品,多经漕运而北上。“自祖宗以来,军国之费,多出于东南。”<sup>②</sup>“朝廷用度,如军食、币帛、茶盐、泉货、金铜、铅银、以至羽毛、胶漆,尽出九道(指两浙、福建等南方)。”<sup>③</sup>生产与消费地区的分离,南方的沉重赋税,实际上影响了南方地区的文化发展。也就是说,因政治的中介作用,北宋时南方强有力经济生产能力,并不直接支持南方的文化发展。文化重心的南移自然也有了问题。2.就研究的手段来说,大

多数研究者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。定量分析固然能反映历史的部分现象,但定量分析不能等同于定性分析。以印刷业为例,据叶梦得《石林燕语》卷八,北宋的四大印刷中心(杭州、蜀、福建、京师),北方只有一处,从数量上南方有明显优势。但由于汴京的政治地位,使当地的刻书机构增多,如国子监、崇文院、秘书监、司天监等都有所属刻书作坊,从而使汴京的刻书机构增多,并且国子监刻印的儒家经典是作为全国学校、书院教科书使用的,这就使汴京的书坊的发行量大大增加<sup>④</sup>。所以,南方的刻书并不能说就超过了北方。这就说明,以定量分析为手段,在实际操作过程中,无意中会排斥一些有用的历史材料,从而使研究的科学性大打折扣。因此,其所得出的结论,往往会偏离历史事实本身。

仅以定量分析为手段的另一缺失是,在强调文化创作者的地域归属性的同时,却往往忽略了文化活动本身。以文学创作为例,北宋的词人,以《全宋词》为依据统计,北宋约有143人,其中南方籍贯的有99人之多,而北方的词人只有44人。因此,从数量来看,文学重心应该居于南方。但实际情形却是,著名的词人如欧阳修、二晏是江西人,但他们的词多写于汴京、颍州等地,绝少作于江西。类似的例如柳永、周邦彦等,情况如出一辙。“一叶障目,不见森林”,研究手段的单一,本质上是把整个历史安排成一个单一的图式,同样会阻碍结论的科学性。

因此对于文化重心南移的研究,研究者一方面必须对历史现象的复杂性有充分的认识,另一方面,在研究手段上要多元化,既要从静态的定量分析入手,也要考虑到各种文化因子所可能具有的活性成份<sup>⑤</sup>。也就是说,只有将文化的静态情况与动态发展结合起来,充分考虑各种历史现象的复杂性,得出的结论才是较为合理的。

## 二 南方士人的崛起与北宋文化格局

从各种因素综合起来看,北宋时,中国文化重心仍居于北方,但文化格局已发生了变化。首先,受朝廷重北轻南的用人政策的影响,南方人才的崛起需要一个过程。因此,就精英文化的创造者来说,南方士人的数量虽然在某些方面超过北方(如词人的数量),但北方仍有自己的优势。北宋开国以后,在政治上有“不用南人为相”的偏见,至天禧元年(1017)王钦若为相,才打破了这个传统<sup>⑥</sup>;在科举考试中,真宗朝的寇准持“南方下国,不宜冠多士”的偏见,极力反对南方人的参政。至哲宗朝,在北人集团全力主张下,终于实行了分区取士之制,特许齐、鲁、河朔五路的北方士人别考,造成了“东南州军,进士取解者二三千人处,只解二三十人,是百人取一人,西北州军取解者至多处不过百人,而所解至十余人,是十人取一”<sup>⑦</sup>的不公正情况。用相与科举考试中的重北轻南,直接导致了南方士人在政治上地位大多不高,并且影响了南方士人入仕。因此,就政治人才来说,北方的数量仍占多数。以《宋史》史传人物的地理分布为例,北宋时人物总数为1541人,其中北方地区961人,占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二,南方地区580人,占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八<sup>⑧</sup>。正史列传中人物,往往包括了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文学艺术等多方面的人才。因此,北宋时史传中的人物以北方居多,说明了南方人才的崛起受朝廷重北轻南的用人政策影响。

其次,因为政治的原因,汴京对南方士人的向心力是巨大的。就宋代士人的知识结构来说,很多是复合性人才,文学、学术、吏事多方面的才能往往集于一身。因此,作为政治中心的汴京,它在吸引南方政治人才的同时,也意味着南方其他方面的人才也流动至汴京。这是显而易见之事。在南渡士人中,真正没去过北方的南方士人寥寥无几<sup>⑨</sup>,其中主要的目的地是汴京。北宋末期,除了官员待阙、士人赴礼部试外,南方士人大致有两个原因而长期留在汴京,其一是南方士人成为京朝官,从而居留汴京。如词人叶梦得,在南渡以前,曾在汴京居留了七年,原因是入朝为官。以大晟府的成员来看,周邦彦,钱塘人。江汉,西安(今浙江衢州)人。就籍贯来说,他们都是浙江人,但他们所进行的文化活动却都在汴京。其二是入太学。北宋太学发展于庆历中,王安石变法时更加重视太学,至徽宗崇宁元年,太学生已达3800人<sup>⑩</sup>。这些太学生中,南方士人中占了很大的比例。以南渡词人为例,南方词人陈东、汪藻、刘一止、王灼、张元幹等都曾入太学。张元幹、刘一止在文坛的名气即是在太学中传开的。李纲曾说“闻仲宗有声庠序间籍甚”<sup>⑪</sup>。陆游曾说“绍圣元符间,汪内相彦章有声于太学。为之语曰:‘江左二宝,胡伸、江藻’。”<sup>⑫</sup>刘一止

在太学时,“尝为晓行词,盛传于京师,号刘晓行。”<sup>⑬</sup>他们在文坛的声名都是从太学开始建立的。

南人北仕,不仅是一种政治活动,同时也意味着是一种文化活动。如司马光编《资治通鉴》时,其几位重要助手,如刘恕、刘攽、范祖禹,都是南人。而南方各种人才在汴京汇聚,加之南方士人在北方各地的宦游,这必然刺激北方文化的进一步繁荣。又,在北宋初期,对于南方士人,朝廷明文规定,“西蜀、岭表、荆湖、江、浙之人,不得为本道知州、通判、转运使及诸事任。”<sup>⑭</sup>对于北方士人的一部分——宗室,则又不准入蜀。这种任人政策,使南方人才集中的地域不能充分利用本地区的人才资源。因此,尽管北宋末南方士人的数量超过北方,南方在各种文化因素中已显示了日趋强盛的态势,但各种重要文化活动却是在北方展开的,文化的重心仍居于北方。

### 三 宋代文人南渡与文化版图的重组

种种迹象表明,在北宋末期,宋代中国的南方在文化上已经表现出了诸多的优异之处,因此,一旦有一项推动力量,促使北方文化优势的急度降低,则文化重心的南移便可以水到渠成了。作为汉族精英文化的主体——宋代文人的南渡,毫无疑问便是这项推动力的重要部分。以文化的一个子系统——文学而言,这种推动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。

第一,由于中原文人的南下与留居北方的南方文人的南归,使活动于南方的文人急剧增加,而活动于北方的文人数量急速下降,南北方文人数量极其悬殊,创作业绩也不可同日而语。以词人为例,《全金元词》收金代70家,词3572首;而据《全宋词》,南宋词人为1059人。其中南渡词人就有488人,词8854首。以诗人为例,清代郭元釭《全金诗》共74卷,诗人358人,诗作5544首。而南宋诗人中,仅陆游一人,诗作就有85卷,9220首<sup>⑮</sup>。又今人所编《全金诗》共分四册,收534位作家,收诗12066首<sup>⑯</sup>。而《全宋诗》共72册,其中后四十五册,全为南宋诗人之作。就诗作数量上,南宋诗人所作估计是金代诗人的10倍。又据清倪燦《补辽金元艺文志》,金代文人有文集的共有74人,总卷数共409卷,其中蔡松年、王寂、赵秉文、王若虚、李俊民、元好问、段克己和段成己等人的文集流传至今,约有121卷<sup>⑰</sup>,而南宋文人的别集存世者,仅南渡文人就有79家,总卷数多达2234卷<sup>⑱</sup>。

从文人及其创作的数量上来看,由于南渡以后,宋金处于对峙状态,南方文人无法在北方进行文化活动,南方不仅成为文人荟萃之地,而且成为文人终身的文化活动之地。因此,南北方文人数量及创作业绩的悬殊,无疑昭示了中国的文化重心已经迁至南方。这是不必争论的。

第二,宋代文人的南渡,促使了原有的南方文学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,从而使南宋起,中国的文学版图形成了重组的态势。

首先,就南渡文人在南方的地理分布来说,以都城临安为中心,在环太湖一带,即当时的两浙路、江南东路、江南西路,是南渡文人最集中的地区。这一地区,在北宋时就是经济发达地区,“两浙之富,国用所恃,岁漕都下米百五十万石,其他财赋供馈,不可悉数”。<sup>⑲</sup>在文化上,这一地区,不仅是文学人才的产生地,同时相对于南方其他地区而言,也是文人活动频繁之地。以唱词为例,苏轼、张先、杨元素、刘孝叔、李公择、陈令举等六位词人,张仲谋、曹子方、刘景文、苏坚、张秉道、苏轼等六位词人前后会于吴兴,雅集唱酬,创作了词史上非常著名的前、后六客词。又著名词人柳永,在苏州、杭州一带曾多次活动,留下了不少词作,最著名的《望海潮》“东南形胜”,即作于杭州。南渡以后,因京畿的文化优势,一些著名的词人,皆荟萃于环太湖一带。如朱敦儒在秀州,康伯可在临安,陈与义在湖州。这些中原文人的文化活动,进一步使这一地区的文学生态向良性循环发展,最终促使苏州——杭州环太湖一带构成了南北向文学轴心。

其次,自宋室南渡以后,北宋的以开封、洛阳为文学重镇的“点”状分布格局被打破,就南宋而言,代之而起的各地文学英才并起的网状分布。

北宋之际,因着政治、文化的优势,汴京为文学重镇自不待言。至于洛阳,“洛实别都,乃士人之区藪。”<sup>⑳</sup>其为文化重镇亦为时人所共知,而其文学的地位也不容小视。欧阳修等“洛中七友”与司马光在洛



阳的组成与频繁活动,就充分显示了洛阳地区文学人才的集中与文学活动的活跃。因着汴京、洛阳的政治及其学术文化优势,一批文化世家迁居于此,从而使这一地区文学人才的数量增多,而杰出的文学家亦时有产生。“宋兴五十载,至咸平、景德中,儒学文章之盛,不归之平棘宋氏,则属之澶渊晁”<sup>②1</sup>。“世家多艺文”<sup>②2</sup>在宋代乃习见之事。因此文化世家聚集之所也是文学空气浓厚的地方。宋代的文化世家,据王明清所述,主要有真定韩氏、东莱吕氏等二十二家<sup>②3</sup>。从这些世家创始人的籍贯地来看,绝大多数为北方人氏。更值得注意的是,由于这些文化世家同时兼为政治世家,其居住地往往集中于京师一带。如真定韩氏,“居京师,廷有桐木,都人以桐树目之,以别相韩矣!”<sup>②4</sup>“李文定本甄城人,既徙京师,都人呼为濮州李家。”<sup>②5</sup>类似濮州李家的现象,南渡以前,乃平常之事。东莱吕氏、河内向氏、两浙钱氏等,南渡以前,皆居住京师开封。世家向京师一带集中的原因较复杂,在此不必展开,但这一现象的文学影响却不容忽略。南渡初杰出的词人朱敦儒、陈与义、向子諲,著名的诗人吕本中等,其原居地都是开封或洛阳。说明世家集中的地区杰出的文学人才较易出现。

文人与文化世家过分集中于某一地区,各地区间的文学资源分布不平衡。就文学的整个发展来说,它不利于全国总体文学人才的培养,以及文学创作生态的多样化。宋室南渡以后,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一现象。

南渡以后,在长达十年的时间之内,政治中心无法固定。北方的文人因南逃路线选择的不同,南方的文学活动在各地皆有频繁的发生。朱敦儒、陈与义、吕本中等文人,其足迹遍及江东、江西、荆湖、两广、福建和两浙,几乎把整个南中国都包涵进去了。南宋都城临安选定以后,在两浙路、江南西路、江南东路是文学人才集中的地域。但福建、荆湖、两广诸路也多有文人占籍而居。即便就东南地区而言,相对于北宋而言,南宋的文人也并不集中于某一点上。都城临安之外,文人在环太湖一带平江、常、润、湖、明、越等地多有分布。相对集中的同时,分布仍是呈局部分散状的。另外,由北而南的文化世家,由于战乱的冲击,家族成员往往不再坚持聚族而居,而是努力在各地寻求自己的发展空间,如东莱吕氏,即分居于江西、浙江各地,昭德坊晁氏,南渡后也散居西蜀、江、浙。从北方迁移而来的文化世家,特别是政治上处于劣势的世家,为了各自的进一步发展,他们向今天的福建、广东一带拓荒,星星之火,可以燎原,这些南渡世家所具体的文化、文学优势,使原来的文学不发达地区的文学生态的有所改变。其后明清时期的岭南诗派、闽派诗人等的崛起,与南渡后这些地区文学生态的改变关系甚密。

由此可见,宋室南渡以后,无论就文化世家的分布而言,还是各种文学人才在南方的活动而言,南宋的文学格局无疑是一种发散式,或者说是一种辐射式的分布。由北宋而南宋,文学的分布图由点状结构向网状结构的转变,这是南宋文学中兴的一个重要背景。

再次,南渡文人在南方的文化活动,进一步填补了一些文学空白,使整个南方的文学优势全方位地凸现出来。所谓文学空白,分二个层面的意思。一是原来南方的一些地区,本身具有一定的文学优势,但因为人才的外流,此一地区的文学活动并不频繁。如以四川、福建为例。四川有苏轼这样的大词人,但苏轼词的创作,却并不在四川;福建出现了柳永、张元幹等著名词人,但柳词的创作却不在家乡,张元幹在南渡前也很少在福建写词。也就是说,在北宋之时,因种种原因,四川、福建等地,就“词”这种音乐文化来说,相对于开封、杭州等地,还是一个空白。这种情况,在南渡以后有了改变。如王灼的词作即有数篇作于家乡,而词人陆游的大部分词作是在四川创作。至于福建,南渡以后,张元幹、李纲等词人在福建多有唱酬,而曾觌、辛弃疾等词人也有作于闽中之词。据王兆鹏先生的《张元幹年谱》,南渡以后,张元幹作于闽中的词作三十八首,其中不乏名作。唱酬的对象有吕本中、李纲、胡铨、叶梦得、富直柔、李弥逊等重臣名士。又稼轩词中,可编年者,有三十二首系七闽之什<sup>②6</sup>。从词序当中,多有“答帅幕”“饮饯席上作”“席上和陈安行”“歌舞甚盛”,从可当时闽中唱词之风。南宋后期,以刘克庄为中心甚至形成了闽中词派<sup>②7</sup>。

如果说南渡文人在福建、四川等地的活动还带有“文化回溯”的性质,那些他们在岭南等地的文化、文学活动则极具有“移风易俗”的意义。南渡以后,一方面,“江北士大夫,多避地岭南者”。<sup>②8</sup>一方面宋金对峙,南宋国土逼仄,两广的政治地位也相应提高,因而吸引了更多的士人宦居于此,即使谪居岭南者,

他们的心态也发生了相当的改观。在这三类人中,既有文学之士,又不乏南宋的名臣重臣。如吕本中、曾几、陈与义、朱敦儒、范成大、张孝祥、吴潜等。他们的到来,各以所长,在当地进行文学活动,因而南渡以后,岭南的文学生态有了相当的改观。就词体的创作来说,北宋之时,两广等地,既没有两广的词人产生,作于岭南的词作也寥若晨星。南渡以后,唱词之风,也渐传于岭南。《樵歌》之中,有十三首词作即于岭南。张孝祥的《于湖词》中,有十首词作于广西<sup>⑨</sup>。李光现存十四首词,其中一半以上是作于岭南的。胡铨今存十五首词,其中有十二首词是作于岭南的。范成大广西桂林时,曾赋《水调歌头》《破阵子》《满江红》《鹧鸪天》等词多首。友人周必大引陈无己的话说:“‘妓园窈窕,争唱舍人之词。’在桂林矣”<sup>⑩</sup>。可见,当时范成大的词在广西的流行。

文学活动在岭南的频繁,只是当地文学生态改变的一个侧面。实际上,南宋以后,岭南文学人才在数量上也有增长,如北宋时没有岭南籍贯的词人,而南宋时,两广的文人有词流传于世者有陈纪、崔与之等八人。虽然在数量上还不能与南方其他地区相比,但与北宋的“零”的纪录,却是一个巨大的突破。并且,就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来说,岭南文人数量的增长与在岭南进行各种文化活动的士人数量的增长,代表的是一种新的文化发展趋势,即中国的文化版图进一步向过去的化外之地伸展。王象之在《舆地纪胜》中介绍岭南时说,“渡江以来,北客避地留家者众,俗化一变,今衣冠礼度,并同中州。”所指出的正是这种中国文化发展的新趋势,而且,推动这种新态势的最原始动力,正是宋代文人的南渡。

①曹之:《中国印刷术的起源》,武汉大学出版社,1994年版,第420页。

②③李焘: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四百六十六,卷一百十八,中华书局1979年起陆续出版点校本,第11141页,第3034页。

④周宝珠:《宋代东京研究》,河南大学出版社,1992年版,第199页。

⑤参袁行霈:《中国文学的地域性与文学家的地理分布》,《中国文学概论总论》第三章,高等教育出版社,1990年版。

⑥邵伯温:《邵氏闻见录》卷一,中华书局,1983年版。

⑦马端临:《文献通考》卷三二,浙江古籍出版社,2000年版。

⑧程民生:《宋代地域文化》第二章第四节,河南大学出版社,1997年版。

⑨参钱建状:《南宋初期的文化重组与文学新变》附录一“词人南渡情形考”,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版。

⑩王栻:《燕翼诒谋录》卷五,中华书局,1981年版。

⑪张元幹:《芦川归来集》卷十“题跋”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78年版。

⑫陆游:《老学庵笔记》卷一,中华书局,1979年版。

⑬陈振孙: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卷二十一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7年版。

⑭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二十三。

⑮赵翼:《瓯北诗话》卷六,人民文学出版社,1963年版。

⑯薛瑞兆、郭明志:《全金诗》,南开大学出版社,1995年版。

⑰⑱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卷一六六,卷一五七、一五八,中华书局,1965年版。

⑲《苏轼文集》第三十二卷《进单谏吴中水利书状》,中华书局,1986年版,第916页。

⑳《明道先生行状》附《门人朋友叙述并序》,《二程集》,第322页,中华书局,1981年版。

㉑喻汝砺:《晁具茨先生诗集序》,转引自《黄庭坚和江西诗派卷》(下卷),中华书局1978年8月版。

㉒黄庭坚《送晁道夫叔姪》,《山谷诗外集补》卷二,《黄庭坚诗集注》,第1625页。中华书局2003年5月版。

㉓㉔㉕王明清《挥麈录前录》卷之二,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8月版。

㉖邓广铭:《稼轩词编年笺注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78年版。

㉗陈庆元:《词中的江湖派——南宋后期闽北词人群述评》,载《词学》第十二期。

㉘李心传: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卷五十六,《丛书集成初编》本。

㉙宛敏灏:《张孝祥词笺校》,黄山书社,1993年版。

㉚孔凡礼:《范成大年谱》,第266页,齐鲁书社1985年版。